

中國文化史

柳詒徵 著

第一編

廣江出版社



中國文化史

柳詒徵 著

第一編

廣江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文化史/柳诒徵 著. —桂林:漓江出版社, 2014. 10
ISBN 978-7-5407-6977-2

I. ①中… II. ①柳… III. ①文化史—中国 IV. ①K20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079955 号

组 稿:郑纳新

责任编辑:鸿 钧

装帧设计:杨鹏广

出版人:郑纳新

漓江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

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22 号 邮政编码:541002

网址:<http://www.lijiangbook.com>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销售热线:021-55087201-833

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印刷

(山东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华路 邮政编码:276017)

开本:690mm×960mm 1/16

印张:58.75 字数:1100 千字

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188.00 元(全三编)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承印单位联系调换。

(电话:0539-2925888)

出版说明

柳诒徵(1880-1956),字翼谋,晚年号劬堂,江苏丹徒人。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、古典文学家、图书馆学家、教育家、书法家,民国时期历任南京高师、东南大学、清华大学、中央大学、浙江大学等校教授及国史馆纂修、中研院院士,新中国成立后任复旦大学教授。柳氏在史学领域著作等身,与陈寅恪、陈垣齐名,时有“北陈南柳”之称。他桃李满天下,培育了张其昀、缪凤林、郑鹤声、向达、胡焕庸、刘损蓁、陈训慈、茅以升、宗白华等一代英才。参与主编了《学衡》《史地学报》《史学杂志》《国风》《国学图书馆年刊》等众多有影响力的文化学术杂志,为我国学术文化的现代转型与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。

柳氏尤长于文化史的研究,《中国文化史》一书是其阐述中国文化的代表作,也是中国文化史的开山之作、巅峰之作,自问世以来深受学界推崇,沾溉极广。该书视野辽远,察见敏锐,材料丰实,体大虑深。全书按时代顺序分为上古、中古、近世三编,每编分若干章,对我国历代典章、政治、教育、文艺、社会、风俗、经济生活、物产建筑、图画雕刻等进行了系统清晰的绍述,其立论行文或援经史,或征诸子百家,或引中外学人说论,援古证今,以今鉴古,史论结合,创见频出,启人深思,极有助于读者、研究者明了我国历史典章制度和文化风习的因革源流与得失,进而识得我中华民族数千年一体、凝聚发展、健行不息的主因与根本。

该书最初以讲义流传,复陆续刊载于一九二五年十月至一九二九年十一月的《学衡》杂志,后汇编成书,不断梓行,迄今版本甚多。然察今日市上诸多版本,舛误不免,遗漏时有,深觉有予以精密校审的必要,

遂以《学衡》原刊为底本,参考不同时期印行的版本,予以勘校,重新出版。整理时,采取如下方法:

1. 原刊为繁体本,今改为通行的简体字;对易引起误解的人名、地名、器物、制度等用字,一仍其旧;异体字、通假字,一般也保持原貌。

2. 原则上只校正误;对原刊漏衍讹倒者,据他本改;对字书未见者而显属误刻者,径改。

3. 标点符号尽量尊重作者习惯用法,兼顾现代通行用法,除明显排印有误径改者外,其余不予改动。

4. 对其中征引,除个别外,均参照原文进行了核对;与现行刊本不符而文从句顺者,基本保持原貌。

因水平有限,错误在所难免,敬请方家批评指正。

漓江出版社编辑部(上海)

二〇一四年十月

现代学术名家对本书的评价

印水心(现代著名学者,曾任京师大学堂教习):

读翼谋所著《中国文化史》两册,此书原为翼谋前在东南大学史学系教授时所用之讲义刻本,数经改订,曾刊登于《学衡》杂志,极为学者所欣赏。全书分中国文化为三大时期:第一期,由远古以迄两汉,是为中国民族,本其创造之能力,由部落而建设国家,构成独立之文化之时期。第二期,自东汉以迄明季,是为印度文化,输入中国,与中国固有文化,有牴牾而融合之时期。第三期,自明季以迄今日,为中印两种文化均已就衰,而远西之学术、思想、宗教、政治,以次输入,相互激荡,而卒相合之时期。叙述详明,议论宏达。

胡适(现代著名学者,曾任北京大学校长、“中研院”院长):

柳诒徵先生的《中国文化史》,曾在《学衡》杂志上发表,去年由钟山书局印行……

此书约有六十余万字,是近年中国出版界的一部大书。中国文化史之试作虽有几位学者计划过至今未有成书。坊间所出小册子,更不足论。柳先生的书可算是中国文化史的开山之作,读者评者都应该记得这一点。因为是开山之作,我们都佩服作者的勇气与毅力,感谢他为中国文化史立下了一个草创的规模,替一般读者搜集了一些很方便有用的材料……

柳先生的书列举了无数的参考书籍,使好学的读者可以依着他的指引,进一步去寻求他引用的原书,更进一步去寻求他不曾引用的材

料。这正是开山的工作。柳先生的论断也许有许多是我们不能赞同的。但他的方法是一种“纲目”法，纲是他的论断，目是他的材料；此法的用意是每下一句论断必须引用材料作根据。读者若能了解此种方法的好处，然后考虑作者的论断是否都有可靠的依据，那才能得着此书的益处。

梁漱溟(现代著名思想家,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):

往日柳诒徵先生著《中国文化史》，就曾举三事以为问：中国幅员广袤，世罕其匹，试问前人所以开拓此抃结此者，果由何道？中国种族复杂，至可惊异。即以汉族言之，吸收同化无虑百数，至今泯然相忘，试问其容纳沟通，果由何道？中国开化甚早，其所以年祀久远，相承勿替，迄今犹存者，又果由何道？此三个问题，便是三大特征。

吴宓(现代著名学者):

近今吾国学者人师，可与梁任公先生连轳并驾，而其治学方法亦相类似者，厥唯丹徒(今自属镇江市)柳翼谋先生诒徵。两先生皆宏通博雅，皆兼包考据、义理、词章，以综合贯通之法治国学，皆萃其精力于中国文化史。

胡先骕(现代著名教育家、生物学家):

予初至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任教时，先生正主讲中国文化史，不蹈昔人蹊径，史学史识一时无两。其所著《中国文化史》，实为开宗之著作。其门弟子多能卓然自立，时号称“柳门”，正与当时北京大学之疑古派分庭抗礼焉。

钱穆(现代著名历史学家):

柳氏又为中国文化史……其书中精义，络绎纷纭，几于触目皆是，俯拾即得……

凡柳氏所陈宋、明、清三代学术大趋,与夫其分别异同得失之所在,较之当时群所鼓器之学风,尽力推尊清代乾、嘉诸儒之考据,而菲薄宋儒义理心性之学者于不屑一顾,正不啻恰相处在一对立之地位。然在当时,北方学者新文化运动之声势方张;柳氏讲学南雍……俊彦群凑,隐然为一方重镇。

缪凤林(现代著名历史学家):

此书以六艺诸史为经,而纬以百家;举凡典章、政治、教育、文艺、社会、风俗,以至经济生活、物产建筑、图画雕刻之类,皆就民族全体之精神所表现者,广搜列举,以求人类演进之通则,以明吾民独造之真际。体例虽为近代史者,而性质则与无锡顾亭林《日知录》之中篇“治道”,阳湖赵翼《廿二史劄记》之第四类“综论历代史迹”相近;其议论亦在二氏之间,涵蕴富而义类宏,近百年来所未有之大著作也。

英士(现代著名学者):

这是一本庄严郑重的巨著,从大体上看来,可以说是目前正统派史学家的代表作品。它既不泥古,亦不骛新。凡是未经确切否认的传说,它都姑予承认。凡是证据尚不充分的新说,它都置之不理。近人通病,每对古的过于怀疑,而对新的过于信仰,看了柳先生的著作,也许要笑他顽固。其实柳先生是不顽固的。例如他说“中国人种之起源,盖不可考”,便不像个顽固派的口吻。假使他在本书之内未言禹为大虫,而说禹有治水之功,这不是因为他对古史信仰过分,而是因为《古史辨》中所曾提出的疑问,至今还是疑问。对于一个正统派的学者,我们不可希望他把疑问当做事实。同时我们还要注意,这本《文化史》是用过多年的讲义,在《学衡》上早已发表过了,柳先生也许是因为年纪老了,懒得修改,故对那些比较值得考虑的新说,亦未加以充分注意。

全书九十万言,大部分是重述古书,所以有人把它当做“史料”看待。然据我们看来,此书中颇有超过史料之处。最明显的是著者常在

引用史料之际,参以己见,加以新的解释。书之主体,毕竟还是柳先生对于中国文化史的见地,而非种种史料之堆积。

张其昀(当代著名历史学家、地学家、教育家):

中国学者常讲读《易》与读史,哲学与史学是相辅相成的。史学有哲学深切著明具体的事例,哲学有史学疏通知远抽象的原理。两者的关系,在《中国文化史》一书中充分发挥出来。柳师著书宗旨,扼要言之,就是要表扬中国的民治精神和学者精神。前者指中华民族群策群力急公好义的精神,后者指中华志士提高人格注重节操的精神。《中国文化史》上册第十章题为“治水之功”。柳师论曰:“治水之难,以人工及经费为首。近世人工皆须以金钱雇之,故兴工必需巨款。吾国古代每有力役,但须召集人民,无须予以金钱。故史书但称禹之治水,不闻唐虞之人议及工艰费巨者。此其能成此等大工之最大原因也。西人但读《禹贡》,不知其时治水者,实合全国人民之力,故疑禹为非常之人。”柳师所说的力役,就是所谓“义务劳动”。孙中山先生手著《地方自治开始实行法》极力主张“双手万能”的重要。因为大禹能以身作则,躬行实践,所以老百姓都能踊跃出力,众志成城,完成治水的大业。

柳师在《中国文化史》上册第廿五章《孔子》,表彰中国之学者精神。他说道:“孔子以为人生最大之义务,在努力增进其人格,而不在外来之富贵利禄。即使境遇极穷,人莫我知,而我胸中浩然,自有坦坦荡荡之乐,无所歆羡,自亦无所怨尤,而坚强不屈之精神,乃足历万古而不可磨灭。儒学真义,唯此而已。”他又说:“虽然,孔子之学非徒为自了汉,不计身外之事也。成己必成物,立己必立人,故修身之后,即推之于家国天下,其于建国、为政、理财、治赋之法,无一不讲求而蘄致用于世。”柳师对史学,主张沿流讨源,援古证今,讲明当代典章文物,以达经世致用之目的。他以为万事非财莫办,取之于民,用之于民,为历史的公律。他对于胡林翼“用士人理财”之说,表示赞同;对于传统说法“轻徭薄赋,便是美政”,他认为不一定都对。

胡焕庸(当代著名地理学家):

柳师讲授的中国文化史,不仅文科的学生要听,理工科的学生也来听,足见其内容的精彩动人。当时在校内用铅字印成讲义,以后由钟山书局、正中书局公开发行过,即著名的《中国文化史》。

这部书共三巨册,约计七十万字,内容博大精深,真是无所不包,从历代的典章制度、文武攻略、各派学说、工商技巧、民俗宗教、货币服饰,无不追本求源,究其发展,举其功用,论其得失。用当今的语言来讲,它的内容,实际上包含着政治史、法制史、军事史、开疆史、学术思想史、科技史、民族史、宗教史等,也可以说是一部百科性专题史。尤其柳师所用的夹叙夹议方法,引述一段原始资料,接着一段评论,既不是枯燥无味的考证,也没有不着边际的空谈,真可说是广征博引,有引人入胜之功。我们如再结合老师晚年另一巨著《国史要义》来看,那就不能不承认,老师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无疑是划时代的了。

蔡尚思(当代著名历史学家,曾任复旦大学副校长):

在柳先生的著作中,《中国文化史》也是大学讲义。此书可说流传最广,解放前各种《中国文化史》无不滥觞于此。此书创稿于1919年,曾于1931年、1947年、1988年等多次重版,全书共八十九万八千余字,引用资料自六经、诸子、廿五史、历代各家著述、国外汉学家论著,以至近代报纸杂志、统计报导,无不详为选辑,共得六百余种之多。由于作者身经清末封建政治腐败濒于崩溃之际,深慨民族自尊心的丧失、崇洋媚外的奴化思想无从抵制,因此蓄志阐述中国文化政教源流,以增强我民族自尊心,抉择中国文化的特点,以勗勉青年学习继承和发扬我国文化的优良传统。这是先生写这一部文化史的根本宗旨……由于先生淹贯经史,尊重史实,故此书征引繁博,叙事章节主题鲜明,至今仍不失为一部内容丰富的有系统的中国文化史重要参考书。

在柳先生的著作中,《中国文化史》一书可说传授最广,不失为从

出版到解放前各种《中国文化史》的“老母鸡”。

苏渊雷(曾任上海世界书局编辑、华东师范大学教授):

其著《中国文化史》，参考书目几达七百余种，自群经、诸子、廿五史、历代各家著述，旁及国外汉学家论著与近代报章杂志、统计资料，靡不广为搜集。主题鲜明，叙事详尽，论断谨严，引文完整。复以小字低格，附列于章节之后，以收相得益彰之效。此实先生著作体例之创格，沾溉后学至为深远。

张舜徽(当代著名历史学家、文献学家):

柳诒徵以后专心致力于研究历史，他通读《二十四史》，对历代政教的利弊，学术的盛衰，都作了深入的考察和研究，把自己研究所得，撰述为《中国文化史》，分上、中、下三编，上编为上古文化史，共三十三章；中编为中古文化史，共二十六章；下编为近代文化史，共十九章。全书除条理旧闻，分题纂述外，在一些问题上有自己的创见。

朱维铮(当代著名历史学家):

柳诒徵的《中国文化史》(一九三二)，尽管以前曾在《学衡》杂志上刊载过，而且“国粹”的气味熏人，然而与某些人贩卖的假古董有颇大区别，即作者对待史料的态度比较严肃，并以学术文化的陈述见长，因而流传颇广。

弁 言

往玷学校讲席，草创文化史稿，管窥蠡测，无当万一，未敢以问世也。吴君雨僧猥附之《学衡》社友论撰，缪赞虞、张晓峰诸子设钟山书局，复因中华纸版印布千部，蜀中又有线装本及缩印本，转相流布。覆视之，恒自愧汗，不足语于述作。既病懒，复牵迫他务，不克充其意增削之，良惧传播之误学者。顾是稿刊布后，梁新会有纵断之作，才成一二目，未竟其绪。王君云五复鸠各作家分辑专史，所辑亦未赅备，且分帙猥多，只可供学者参考，不便于学年学程之讲习。又凡陈一事，率与他事有连，专治一目者，必旁及相关之政俗，苟尽苴缠复，又无以明其联系之因果，此纵断之病也。他坊肆有译籍及规仿为之者，率不饜众望。荏苒迄今，言吾中国文化，盖尚未有比较丰约适当之学校用书。吴君士选乃为正中书局订约复印是稿，且属再为弁言。嗟乎！此覆酱瓿之本，阅廿年无进境，尚安足言！无已，姑仍其管蠡言之。

史非文学，非科学，自有其封域。古之学者治六艺，皆治史耳。故汉志有六艺，不专立书目。刘宋以史俪文、儒、玄三学，似张史学，而乙部益以滋大。顾儒学即史学，而玄又出于史，似四学之并立未谛。近世学校史隶文科，业此而隳其曹者称文学博士，名实诡矣。西国史籍之萌芽，多出文人，故以隶文科，与吾国邃古以来史为政宗异趣。近人欲属之科学，而人文与自然径庭，政治、经济、社会诸学皆产于史，子母不可偶，故吾尝妄谓今之大学宜独立史学院，使学者了然于史之封域非文学、非科学，且创为斯院者，宜莫吾国若。三二纪前，吾史之丰且函有亚洲各国史实，固俨有世界史之性。丽、鲜、越、倭所为国史，皆师吾法。夫以数千年丰备之史为之干，益以近世各国新兴之学拓其封，则独立史学院之自吾倡，

不患其异于他国也。

吾国圣哲遗训曰：立天之道曰阴与阳，立地之道曰柔与刚，立人之道曰仁与义。持仁义以为人，爰以参两天地，实即以天地之道立人极，故曰天地之道，博也，厚也，高也，明也，悠也，久也。博厚配地，高明配天，悠久无疆。又曰：惟天下之至诚，为能尽其性；能尽其性，然后能尽人之性；能尽人之性，然后能尽物之性；能尽物之性，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；可以赞天地之化育，则可以与天地参矣。人之性根于天地，汨之则日小，而人道以亡；尽之则无疆，而人道以大。本之天地者，极之参天地，岂惟是营扰于物欲，遂足为人乎！故古之大学明示正鹄，曰明德，曰新民，曰止于至善。立学校，非以为人之资历，为人之器械也。又申之曰：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，先治其国；欲治其国者，先齐其家；欲齐其家者，先修其身；欲修其身者，先正其心；欲正其心者，先诚其意；欲诚其意者，先致其知；致知在格物。又曰：自天子以至于庶人，壹是皆以修身为本。庶人修其身，不愧天子；天子不修其身，不足侔庶人。此是若何平等精神！而其大欲在明明德于天下，非曰张霸权于世界，攫政柄于域中也。彝训炳然，百世奉习，官礼之兴以此，文教之昌以此。约之为史，于是迁、固之学为儒之别子史之祖构者，亦即以此。迁之言曰：“夫学者载籍极博，犹考信于六艺。”又曰：“究天人之际，通古今之变，成一家之言。”固之言曰：“修六艺之术，观九家之言，舍短取长，可以通万方之略矣。”又曰：“凡《汉书》，叙帝皇，列官司，建侯王。准天地，统阴阳，阐元极，步三光。分州域，物土疆，穷人理，该万方。纬六经，缀道纲，总百氏，赞篇章。函雅故，通古今，正文字，惟学林。”呜呼！吾圣哲之心量之广大，福吾族姓，抚有土宇，推暨边裔，函育万有，非史家之心量能翕受其遗产，恶足以知尽性之极功。彼第知研悦文藻，标举语录，钻索名物者，盖得其偏而未睹其全。而后史之闾冗，又缘政术日替，各族阑入，虽席圣哲之余绪，而本实先拨。顾犹因其服习之久，绵绵然若存若亡，而国史、方志、文儒之传记，得托先业而增拓其封畛焉。吾之翦劣，固不足以语史，第尝妄谓学者必先大其心量以治吾史，进而求圣哲、立人极、参天地者何在，是为认识中国文化之正轨。徒姝姝暖暖于一先生之言，扣槃扞籥，削足适履，则所谓不赅不备一曲之士耳。

虽然，世运日新，吾国亦迈进未已，后此之视吾往史，殆不过世界史中之一部

域、一阶程，吾人正不容以往史自囿。然立人之道，参天地，尽物性，必有其宗主，而后博厚高明可推暨于无疆。故吾往史之宗主，虽在此广宇长宙中，若仅仅占有东亚之一方，数千祀之短晷，要其磊磊轩天地者，固积若干圣哲贤智创垂赓续以迄今兹，吾人继往开来，所宜择精语详，以诏来学，以贡世界，此治中国文化史者之责任。而吾此稿之择焉不精、语焉不详之不足副吾悬想，即吾所为覆视而愧汗者也。迁《史》曰：“述往事，思来者。”吾岂甘为前哲之奴，正私挟其无穷之望，以企方来之宗主耳！

一九四七年夏五月

柳诒徵

绪 论

历史之学，最重因果。人事不能有因而无果，亦不能有果而无因。治历史者，职在综合人类过去时代复杂之事实，推求其因果而为之解析，以诏示来兹，舍此无所谓史学也。人类之动作，有共同之轨辙，亦有特殊之蜕变。欲知其共同之轨辙，当合世界各国、各种族之历史，以观其通；欲知其特殊之蜕变，当专求一国家、一民族或多数民族组成一国之历史，以觐其异。今之所述，限于中国。凡所标举，函有二义：一以求人类演进之通则，一以明吾民独造之真际。盖晚清以来，积腐褫著，综他人所诟病，与吾国人自省其阙失，几若无文化可言。欧战既辍，人心惶扰，远西学者，时或想象东方之文化，国人亦颇思反而自求。然证以最近之纷乱，吾国必有持久不敝者存，又若无以共信。实则凭短期之观察，遽以概全部之历史，客感所淆，矜馁皆失。欲知中国历史之真相及其文化之得失，首宜虚心探索，勿速为之判断，此吾所渴望于同志者也。

吾书凡分三编：第一编，自邃古以迄两汉，是为吾国民族本其创造之力，由部落而建设国家，构成独立之文化之时期；第二编，自东汉以迄明季，是为印度文化输入吾国，与吾国固有文化由抵牾而融合之时期；第三编，自明季迄今日，是为中印两种文化均已就衰，而远西之学术、思想、宗教、政法以次输入，相激相荡而卒相合之时期。此三期者，初无截然划分之界限，特就其蝉联蜕化之际，略分畛畔，以便寻绎。实则吾民族创造之文化，富于弹性，自古迄今，绵绵相属，虽间有盛衰之判，固未尝有中绝之时。苟从多方诊察，自知其于此见为堕落者，于彼仍见其进行。第二、三期吸收印欧之文化，初非尽弃所有，且有相得益彰者焉。

中国文化为何？中国文化何在？中国文化异于印、欧者何在？此学者所首应致疑者也。吾书即为答此疑问而作。其详具于本文，未可以一言罄。然有一语须先为学者告者，即吾中国具有特殊之性质，求之世界无其伦比也。夫世界任何国家之构成，要皆各有其特殊之处，否则万国雷同，何必特标之为某国某国？然他国之特殊之处，有由强盛而崩裂者，有由弱小而积合者，有由复杂而涣散者，事例綦多；而求之吾民族、吾国家，乃适相反。此吾民所最宜悬以相较，借觐文化之因果者也。

就今日中国言之，其第一特殊之现象，即幅员之广袤，世罕其匹也。世界大国，固有总计其所统辖之面积广大于中国者，然若英之合五洲属地，华离庞杂号称大国者，固与中国之整齐联属，纯然为一片土地者不同。即以美洲之合众国较之中国，其形势亦复不侔。合众国之东西道里已逊于我^①，其南北之距离则尤不逮^②。南北距离既远，气候因以迥殊。其温度，自华氏表平均七十九度以至三十六度，相差至四十余度。其栖息于此同一主权之下之土地上之民族，一切性质习惯，自亦因之大相悬绝。然试合黑龙江北境之人与广东南境之人于一堂，面叩其国籍，固皆自承为中国之人而无所歧视也。且此等广袤国境，固由汉、唐、元、明、清累朝开拓以致此盛。然自《尧典》《禹贡》以来，其所称领有之境域，已不减于今之半数。

《书·尧典》：“分命羲仲，宅嵎夷，曰暘谷。”“申命羲叔，宅南交。”
“分命和仲，宅西，曰昧谷。”“申命和叔，宅朔方，曰幽都。”^③

《书·禹贡》：“东渐于海，西被于流沙，朔南暨声教，訖于四海。”
圣哲立言，恒以国与天下对举。

① 中国东至西凡六十度五十五分，美国东至西凡五十七度三十九分。

② 中国南至北凡三十八度三十六分，美国南至北凡二十四度二十六分。

③ 今人多疑《尧典》为儒家伪造，不可尽信。然《墨子·节用篇》：“昔者尧治天下，南抚交趾，北降幽都，东西至日所出入，莫不宾服。”足见《尧典》所言国境非儒家臆造之语。即使此等境界，为儒、墨两家想象之词，初非唐、虞时事实，亦可见春秋之末战国之初之人，已信吾国有此广大领域也。[柳曾符按：“1899年后，殷墟甲骨出土，有大版记四方风名者数版，与《尧典》所记合，亦可见《尧典》非儒家伪造。胡厚宣先生有《甲骨文四方风名考释》一文，足与王国维《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》并为卜辞证史名篇。”]

《老子》：“以正治国，以奇用兵，以无事取天下。”“大国者下流，天下之交。”

《大学》：“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，先治其国。”“国治而后天下平。”

此虽夸大之词，要必自来所见，恢廓无伦，故以思力所及，名曰“天下”。由是数千年来，治权时合时分，而国土之增辟初无或间。今之拥有广土，皆席前人之成劳。试问前人所以开拓此天下，转结此天下者，果何术乎？

第二，则种族之复杂，至可惊异也。今之中国，号称五族共和，其实尚有苗、僮、蛮诸种，不止五族。其族之最大者，世称汉族。稽之史策，其血统之混杂，决非一单纯种族。数千年来，其所吸收同化之异族，无虑百数。春秋战国时所谓蛮、夷、戎、狄者无论矣，秦、汉以降，若匈奴，若鲜卑，若羌，若奚，若胡，若突厥，若沙陀，若契丹，若女真，若蒙古，若鞑靼，若高丽，若渤海，若安南，时时有同化于汉族，易其姓名，习其文教，通其婚媾者。外此如月氏、安息、天竺、回纥、唐兀、康里、阿速、钦察、雍古、弗林诸国之人，自汉、魏以至元、明，逐渐混入汉族者，复不知凡几。

《汉书》：“金日磾，字翁叔，本匈奴休屠王太子也。”

《晋书》：“卜珽，字子玉，匈奴后部人也。”“段匹磾，东郡鲜卑人也。”“乔智明，字元达，鲜卑前部人也。”^①

《通志·氏族略》：“党氏本出西羌。”

《唐书》：“王世充，字行满，本姓支，西域胡人也。”“李怀仙，柳城胡人也。”“哥舒翰，突骑施首领哥舒部落之裔也。”“代北李氏，本沙陀部落。”“王武俊，契丹怒皆部落也。”“李光弼，营州柳城人，其先契丹之酋长。”“李怀光，渤海靺鞨人也。”“高仙芝，本高丽人。”“王毛仲，本高丽人。”“高崇文，其先渤海人。”“姜公辅，安南人。”“史宪诚，其先出于奚虏。”“李宝臣，范阳城旁奚族也。”

《通志》：“支氏，其先月支胡人也。”“安氏，安息王子入侍，遂为汉

^① 元魏以后，鲜卑人之化为汉族者，不可胜数。